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四方面军卷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四方面军卷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八至第十部分文章 97 篇

八、西进康北

踏上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郑维山

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们的革命离开了它就不能胜利。一支武装部队离开了它就要遭受失败。这是多年的革命实践所证实的真理。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从川西懋功地区开始北上。8月间，经由毛儿盖一带分兵进入草地。这时，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丧失了信心，既怕蒋介石，又怕日本帝国主义，幻想偏安一角逃避斗争，因而不顾党中央、毛主席的再三劝说，擅自将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一部分部队从草地拖回川西。

草地行军的艰苦，本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二次过草地，更是苦不堪言。特别是又值深秋，无衣无食，部队刚刚经过包座、松潘苦战，掉队的人日渐增多，冻死、饿死的同志更是不少。一时部队中思想混乱。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北上呢？为什么又经过草地向南走呢？南下跑向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时，一方面军已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下北出草地，胜利地通过腊子口，进入了甘南。

四川军阀得悉我孤军南下，纠集了50多个团，北起懋功层层布防。

敌人把懋功通往宝兴之间的栈道拆去了木板，并且把栈道的许多横木锯坏了，以此防止我军向岷江以西的邛崃、大邑地区推进。我军在强敌面前，以两经草地疲惫之师攻占懋功后，攀过被破坏了了的栈道，翻越夹金山——大雪山，打下了宝兴县城。这次战役，虽然歼敌约四个团，可是当我军顺河而下，进入雅（安）名（山）地区时，又遇到了敌刘湘、杨森、李抱冰、刘文辉等部 40 多个团。他们固守着有纵深配置的碉堡封锁线，阻击我军向邛崃、大邑迫近。我军遂在百丈关一带，与敌展开了恶战。

百丈关，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是一个重要的隘口。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周围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和稻田；是敌碉堡封锁纵深配置的中心。战斗的第一天，我军以八十八师居中，二十五师于左翼，三十一军的主力于右翼，分三路向敌发起冲击。同志们冒着激烈的炮火，在轻重机枪封锁敌碉堡枪眼的一刹那，猛扑上去，以手榴弹消灭碉堡里的敌人。我军以极其旺盛的攻击精神，一鼓作气，连续敲垮敌人三道碉堡封锁线，越过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下午 2 点多钟，部队正继续向前推进，忽然得到情报：刘湘在邛崃山前百丈关西北一带山岗上，埋伏了十多个旅，妄图乘我主力在前，侧后空虚时，发起全线反突击，以配合名山之敌包围歼灭我军。在此情况下，军首长立刻命令我师停止前进，把阵地移交给二十五师，准备夜袭敌人。

当晚，我们以善于夜战的“夜老虎”团——二六五团，出敌不意，摸上了长满松树的狭长的山岗。邹丰明团长、黄英祥政委，肩并肩带着两个营，顺着山岗向前打。战斗中每个指战员都如生龙活虎，挥舞着闪亮的大刀直插敌人纵深。打到天快亮，我们便控制了几处险要阵地，敌人企图包围我们的计划破产了。但是，亲自在邛崃督战的刘湘并不甘心，天亮之后，又组织了好几个旅，从三面反扑上来。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恶战，在我们的环形阵地前展开了。

敌人不仅有猛烈的炮火，而且有飞机配合。据俘虏说，刘湘连续

发出了数道措辞严厉的手令，说什么临阵畏缩不前者，连长有权枪决排长，营长有权枪决连长……以此类推，直到他这个总司令有权枪决师长。这就难怪敌人这一天冲得那么凶。他们从整营整连的冲锋，改成了整团整团的集团冲锋。炮火之猛，打得我军阵地上落了老厚的一层松枝。敌人的死伤极为惨重，山坡上，稻田里，尸体累累。我们的伤亡也不断增加。师的指挥所跟前一个班，打到下午只剩下三个人了。但是这三个人，却像钉子钉在那片树林里似的，扼守着阵地。敌人冲来了，他们从三个方向投出集束手榴弹，趁着爆炸的浓烟，呼叫着分头冲下去。把敌人杀退后，三个人又从容地回到原处。战士们就是这样，以一当百地和敌人厮杀。这样的恶战，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

百丈关战斗的结局，进一步暴露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错误。歼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不开局面，最后只好退出了这场拼消耗的恶战。

自南下以来，由于全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奋身杀敌，曾先后打了一些胜仗；仅在百丈关战斗中，歼灭敌人就有1.5万多名，并以极大的毅力忍受和战胜了重重困难。但这些胜利，并没能改善我们的困境。

后来得知，当张国焘坚持错误路线，拖着红军开始从草地南下时，毛主席就已经指出：向南无论就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极端不利的，红军将要遭受空前未有的困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事实完全像毛主席预料的那样，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源、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草树叶充饥。有不少的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加之邛崃、大邑、名山等县靠近成都，敌人统治力量很强，兵力集中。特别是10月中旬，蒋介石亲自给四川军阀划分了势力范围，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大小军阀一起来对付我们。当时参加百丈关战斗的几乎包括了四川所有的地方实力派。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形势，仅靠我军指战员的英

勇顽强是不能打出个结果的！

百丈关战斗后不久，敌薛岳乘我苦战方罢未得休整，又纠集了十多个团向天全杀来。为保障我军从容向川康边界转移，上级命令我八十八师主力自芦山驰往天全，配合红三十三军防御敌人的进攻。我师一到即与敌激战于天全城下，头上有敌人的飞机，地面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我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又一次以大刀、手榴弹击溃敌人的进攻。就在这次战斗结束后不久，我军主力大部撤出了川西。

1936年3月，我军由丹巴西进，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山，占领西康的道孚、炉霍、甘孜后，才摆脱了敌人，获得休整的机会。我们三十军到达甘孜后，熊厚发同志率师部及师的主力驻守甘孜，我和二六五团来到了甘孜以西的绒坝岔。

当时，全军最大的困难仍是物资缺乏。百丈关战斗后，时已隆冬，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里御寒；过夹金山前后，有的部队只得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由于数月来奔波于雪山草地，复经川西苦战，吃不上喝不上，人人面黄肌瘦，疲惫不堪。想起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时的情景，觉得半年来的变化太大了。这时虽然获得短期的休整，但是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是不长粮食光长草的游牧区，全军数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只得以野菜饱腹。总指挥部也曾派代表前往杂谷脑喇嘛寺，向藏胞买了一些牦牛、酥油，炒面和藏布。但这些物资平均分到每一个红军指战员手里，却少得可怜！

而当地藏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封建贵族的层层剥削，早已一贫如洗。我军初到，言语不通，他们过去又受尽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欺侮，对我军心存疑惧。经过我们耐心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他们才开始敢于接近我们。但一般群众穷得糌粑都吃不上，哪能拿出什么来帮助我们呢？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二、六军团老大哥再过

些时候，就要来和我们会合了。经历过和中央红军会师的欢乐与分离的痛苦，我们越发觉得和二、六军团同志会合的珍贵。全军自下到上都要求搞好两军之间的团结。我们眼下虽然过着不温不饱的生活，但每个人都在苦苦思索，要拿出点什么款待远道而来的老大哥。我们曾派出许多小部队由当地藏民带路，到草原上寻找牛群，准备买一批回来，但反动土司一听说我们来，早把牛羊赶得远远的了。

一天，德格土司的叶巴（管军事的官员）纠集五个县的藏民骑兵，突然包围了我们。为了避免和藏民发生冲突，争取和平解决，我们只是守在村里。相持很久，总不能解除这一僵局。我和邹丰明、黄英祥同志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当晚把“夜老虎”撒出去，摸一批俘虏回来，通过他们来进行工作。

俘虏抓回来了，我们连夜和他们谈话，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我们主张中国的各民族之间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等等。并告诉他们绒坝岔的藏民和我们处的很好，如果不信可以自己去问。通司把我们的话一句句翻译给他们听。他们乍听时若惊若疑，不多时便叽哩咕噜地低声议论。这时在俘虏中又查出了那个叶巴。经我们耐心向他讲解，把他送到甘孜。不久，李先念政委和他签订了“和约”，我军用银洋买了一批羊毛和一些牛、羊、青稞。

于是部队便卷入打毛衣运动。上级号召每人打一件，作为和二、六军团老大哥会师的礼物。

4月，四军一部与三十二军由道孚南下，击溃敌主力李抱冰师两个团，占领雅江后，在理化（今理塘）甲洼与红六军团会合。6月底我们也在绒坝岔与从巴安（今巴塘）北上的红二军团会合。真是尝尽离别苦情的人，愈益懂得欢聚的难得。全军又一次投入激动的欢乐中。

接风宴席不是野菜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一般的牛羊肉，而是地地道道的山珍海味——海参、鱼翅等。这些东西还是我们刚进绒坝岔时，全歼国民党保安团时缴来的。席间任弼时、贺龙同志关切地询问和中央红

军分家的情况。我们讲述时，他们严峻地沉默着，也不好当面说什么，但看得出他们的心情很沉重。

和二、六军团会合后，在甘孜成立了党的西北局委员会。朱总司令、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积极主张北上与中央会合。当时数万红军散布在人烟稀少物资缺乏的川康高原上，给养又近枯竭，迫使张国焘难于坚持己见。在红四方面军中，尽管当时还未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罪恶进行清算，但广大指战员的心始终是向着党中央，向着毛主席的。一年来的经历和铁的事实，使大家开始认识到，张国焘路线是一条罪恶的路线。这样我们两支部队兄弟般团结在一起，并肩携手，再次克服了草地的重重困难，踏上了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第380—385页。

第二次北上

徐深吉

1935年9月至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在川康边转战、徘徊了近一年之久，经历了二次北上、三过草地的艰苦历程。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徐向前总指挥，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带领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迭摧强敌，为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实现一、二、四方面军会宁大会师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

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后，张国焘就更积极地推行他的南下错误方针。9月15日，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提出了“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的战斗口号。9月17日，下达了南下命令，已经过了草地的前敌指挥部和四军、三十军。同左路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五军和三十二军，以及红军大学部分同志，分别从阿坝和巴西、班佑地区出发。再过草地，向川康边的马塘、松冈、党坝、大金川一带集结。这时，我们踏着川西北高原的茫茫草地。生活更艰苦，更难熬。许多战

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而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让更多的阶级兄弟走出草地，各级领导干部的乘马，都让给伤病员骑。同志间互相搀扶，互相勉励，友爱之情，难以言表。有的拽一下马尾巴，就能转危为安；有的被推上一把，就能继续前进。一口水，一把干粮，都能救活一个同志。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东莎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他不顾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徐向前总指挥的反对，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在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方针指导下，我军自9月中旬至11月底。南下川康边地区。广大指战员历尽千辛万苦、连续作战，先后打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取得了歼敌2.3万余人的大胜利，但我军伤亡也很惨重，于是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的严重碰壁。

10月，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随后又打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多师。消息传来，全军指战员感到欢欣鼓舞，对张国焘的南下错误方针，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胜利，和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的失败恰成鲜明对比。事实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群众。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强烈和高涨。

这期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正大举向华北逼进，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2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12月27日，根据中央决议，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论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1936年1月中旬，收到中央决议的电报后，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同志，认真讨论，一致拥护。同时，也收到张浩同志来电，告知国际同意中央的路线。而张国焘仍然坚持分裂主义错误，继续攻击中央，蛮横地压制部队对他的批评。

这一年，我们在天全、芦山地区过的冬，遇到了这里最冷的一个冬季。部队衣服单薄，给养不足。经过整编后的国民党川军，集中了80多个团的兵力，向我大举进攻。2月上旬，蒋介石嫡系部队薛岳部六七个师尾追中央红军，进到川西平原，一步步向我进逼，使我军处在既不可能南进，又不能东进的困难境地。2月14日，张国焘收到林育英（张浩）、张闻天来电，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提出了三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北上陕甘；第二个方案是就地发展；第三个方案是南下转战。就以上三个方案，中央认为执行第一个方案为上策。究竟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同志，认真讨论了中央来电，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个方案。于是，就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补充计划》，决定西进道孚、炉霍、甘孜地区，争取时间进行休整补充，筹集粮秣物资，待机北上。

（二）

2月11日至23日，我红军主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丹巴转向西进。

当时，我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任师长，率领二七三团、二七六团，受命担任方面军北上的后卫掩护任务。我们的行动，由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直接指挥。总部拨给我一部无线电台，直接同总司令部、

总指挥部联系。师政治委员桂干生同志，率领师直属部队和二七七团，已在夹金山以北的懋功、达维地区。我向部队传达任务时，干部高兴万分，纷纷表决心。二七六团政委张国学说，太好了，一定保证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二七三团政委庄振风（庄田）说，我们五军团（二七三团原是五军团的三十九团和九十一师二七三团对调的）从中央苏区出发后，就常担任后卫掩护任务，这次任务虽然艰苦些，但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完成。总部规定：部队从天全、芦山出发时，必须尽量多带粮食，所有干部的乘马，一律驮粮食，还要筹备布匹，做帐篷和衣服。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为再过草地做准备。

那些日子，每天总有几架敌机在我们头上投弹和扫射，几乎天天要打仗。我记得宝兴一仗打得最激烈。当时我军主力尚未翻越夹金山，敌人突然以两个团的兵力猛攻宝兴城南关。我们师二七六团和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予敌以坚决打击，毙伤敌百余人，将其击退。

我们过夹金山时，已到3月初了。夹金山是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由于高山缺氧，越接近山顶（分水岭），越感到吃力，使人气喘吁吁。上午12点钟，我们部队爬上山顶，越过分水岭，迎面吹来的是刺骨的寒风。我冷丁打了一个寒噤，上山时汗湿的衣服变成冰铠甲，紧紧的贴在身上。可是山南狭谷中，山青水秀，春光明媚。这真是一山之隔，两个世界。

我率部到达维、懋功，同桂干生同志会合后，二七七团即随三十一军军部去道孚、炉霍地区。师直属部队和二七三团、二七六团留驻丹巴地区，受红五军董振堂军长指挥。

丹巴，在大渡河上游的大金川河边。周围有夹金山、大炮山、折多山环抱。地形十分险要，是西进甘孜、东出懋功的主要道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走过这里。丹巴县城无城墙，只有100多户居民，坐落在大金川河右岸。县城北边有一条由西北流来的小河。每年春夏季的下午三四点钟，顺两河刮来的风相遇。将河水卷成高高的水柱。然后洒在

河岸的一块巨石上，在阳光照射下，像珍珠洒落，色彩绚丽，蔚然壮观。站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这奇观美景。这里空气湿润，气候温和，山上山下，一片葱绿，到处生长着又鲜又嫩的野韭菜。它已成为我们师直属部队不用播种而食之不尽的美味蔬菜。多吃野菜，也补助了部队粮食的不足。

在丹巴，我们师直属部队驻县城关区。二七六团驻县城西北十里外的绰斯尼。二七三团驻县城以南党岭寨地区，向南警戒，并控制大金川河上通向懋功的铁索桥。

一天，敌邓锡侯部一个营带领 1000 多名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夜间偷袭我二七三团第二营阵地。激战两小时，被我二七三团主力击溃，毙伤敌 50 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 20 余支，刀数十把。第二天，敌人一部，携带迫击炮，进至丹巴县城大金川河东岸的山上。天刚拂晓，乘我部队出早操时，向我开炮 20 余发。因为山高 500 余米，又有大金川河阻隔，我军无法反击。约一小时后，敌人退去，我无伤亡。

(三)

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后，积极进行第二次北上的准备工作。3月初，我们从电报上看到红军总司令部指定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同志，组成了粮食委员会，负责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制肉干），要求每人平均达到 15 天的需求量，我们师在丹巴地区，遵照红军总司令部的指示，积极进行物资准备，加强部队训练。在筹粮准备的同时，北上的组织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进行整编。共编六个军，16 个师，28 个团。我们三十一军两个师、六个团未变。

全军共计四万余人，与南下时的人数相比，减员过半，这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造成的严重恶果。部队整编后，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军事训练。我记得训练内容主要是根据敌情、地形，着重演练打骑兵、打堡垒、隘路、夜战和强渡江河等战术和技术。

4月1日，红军总司令部又发出《关于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的行动计划与当前任务，为实现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最近的行动计划：（1）首先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团。（2）首先赤化西康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北发展。”

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错误方针彻底破产。6月8日，我们接到关于取消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的电报。

6月25日，红军总司令部作出了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分路北上的部署。6月26日，即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率八十九师组成北上先遣军，由甘孜出发，北出阿坝，为后续部队筹集粮食等物资。6月28日，正式颁发了《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命令要求：“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扩大与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策）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

6月28日，收到红军总司令部命令我师集中丹巴北进的电报。要我们逐步将分驻各地的部队全部收回丹巴，“你们直率三团仍住丹巴，准备7月7日撤收警戒，全集丹巴：8日向绥出动，直受董、黄指挥（指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但此时须佯言我军要向天、芦进攻以迷惑敌人。”后来，我们就是按总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

(四)

1936年3月底，红二、六军团已转战到川、黔、滇边地区，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朱德同志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对二、六军团的前途极为关心。鉴于二、六军团已经转战到滇西北地区，正继续北进，准备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为此，朱总司令提议：四方面军暂在现地补充休整。接应二、六军团北进。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和张国焘，都同意这个提议。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更是兴高采烈，激情满怀，积极准备迎接二、六军团的会合。

4月21日，徐向前总指挥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部队中广泛进行了迎接二、六军团会合的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徐向前总指挥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军都是一家人，上一次（指张国焘率军南下）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关系，要接受教训。兄弟之间闹意见是难免的，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说什么也不能闹分家。现在，二、六军团又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必须指出，每一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这些话，讲得何其好啊！徐总指挥的动员讲话。我们虽然没有当面聆听。但过了些日子就看到了这个讲话材料。深受教育和鼓舞。全师指战员对搞好同二、六军团关系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增强了信心，决心按照徐总指挥的讲话精神去做。在甘孜、炉霍地区的部队，更是满腔热忱地投入迎接二、六军团老大哥部队的准备工作。从领导干部到每一个战士，人人动手，打草鞋、织毛衣、缝帐篷、写标语、排节目、赶制慰问品。真是群情振奋，热闹非凡。与此同时，各部队在驻地人民群众中也进